

走进新的释古时代丛书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成果

孟祥才

王永波

胡新生

吴志刚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大舜文化与夏商西周历史

上册

014005249

G122  
48  
V1

走进新的释古时代丛书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成果



孟祥才 王永波  
胡新生 吴志刚

著

# 大舜文化与夏商西周历史

上册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北航

C1692550

G122  
48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舜文化与夏商西周历史/孟祥才等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209-07813-9

I . ①大… II . ①孟… III . ①舜—文化研究②中国历史—研究—三代时期 IV . ①G122②K221.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223428号

责任编辑: 李明功

**大舜文化与夏商西周历史**

孟祥才等 著

---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240mm)

印 张 42.75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813-9

定 价 88.00 元(上下册)

---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 (0531)82079112



## 绪 论

《史记》开篇第一章《五帝本纪》，记述了我国历史由野蛮走向文明进程中的五位人文始祖——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五帝被认定为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时代被定位为国家正式出现前的原始社会末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大量与之相对应的遗址和丰富的文物促使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重新认识五帝和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不少学者将中国进入文明的时代提前，认定黄帝已经站在了文明的起点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具有可靠的考古学的依据。

在《五帝本纪》的记载中，黄帝和虞舜的事迹最为丰富。而作为五帝殿军的虞舜，在其他文献中的记载，更是远远超迈前面的四帝。不仅在经书《尚书》、《易传》、《诗经》、《礼记》、《大戴礼记》，史传《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典籍中有其事迹和思想的记载，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的诸子如《论语》、《墨子》、《管子》、《孟子》、《荀子》、《尹文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法言》、《列子》、《颜氏家训》等书中，虞舜也是频频出现的人物。虽然炎、黄二帝是海内外中国人达成共识的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始祖，但实际上，虞舜在政治、思想、道德等诸多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却是任何夏代以前的圣帝名王所不可比拟的。他在从尧那里以禅让的方式取得帝位的三十年中，选贤任能，建立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领域推进了中国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化的步伐，对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思想文化上有着划时代的创造，对君民关系、君臣关系、民族关系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理念，以大孝双亲、友爱兄弟诠释了孝悌观念的真谛，对后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



是儒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理清虞舜时代的历史真相,研究他在推进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各种制度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和促进思想道德进步的种种具体办法,探索虞舜文化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影响,就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因为它能够揭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人类历史走向文明进程中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展现他们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揭示他们创造的文明成果如何惠及子孙和中国的未来。

为此,我们力求在对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充分消化和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有关虞舜的历史传说神话、相关古帝与虞舜族缘的衍化轨迹、大舜的历史文化与发展迁徙以及虞代社会发展状况及其考古学文化、夏商西周三代历史及其对虞舜文化的弘扬等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述论和探颐,以便最大限度地再现文明曙光初照年代中国的真实历史。



# 目 录

绪 论 .....	001
<b>第一章 虞代历史与大舜文化研究 .....</b>	<b>001</b>
引 言 .....	001
第一节 传统的古史架构 .....	003
一、古史传说的不同体系 .....	004
二、古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	013
三、有虞氏活动地望的界定 .....	023
第二节 虞舜时代的史学定位 .....	029
一、先秦时期的古史断代 .....	030
二、首邦学说与相关理论 .....	038
三、虞夏古国疆域与部族分野 .....	045
第三节 有虞氏的族缘衍化轨迹 .....	053
一、帝舜帝喾太皞说 .....	054
二、虞舜与伏羲的族缘关系 .....	062
三、虞舜与炎帝的族缘关系 .....	066
四、炎黄族系及其与少皞的关系 .....	069
五、两代少皞与帝舜部的分衍 .....	081
六、考古学揭示的中原逐鹿与古族互动 .....	088
第四节 虞舜的出仕与生平 .....	094
一、虞舜家世与出仕经历 .....	095
二、虞舜居摄的建树与政绩 .....	101



三、君临天下的帝舜 .....	104
四、窜三苗与德化三苗 .....	108
五、帝舜生平与禅禹 .....	112
<b>第五节 虞舜家族世系辩证 .....</b>	<b>119</b>
一、有虞氏不祖颛顼论 .....	119
二、尧非喾子考辨 .....	132
三、瞽叟帝挚与虞舜家世疏证 .....	138
四、虞舜先祖史略与发展梗概 .....	142
<b>第六节 虞代社会及其考古学文化 .....</b>	<b>158</b>
一、虞代的考古学年代位置 .....	159
二、虞代政体的国家文明属性 .....	163
三、考古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状况 .....	171
<b>第七节 虞舜创立的礼仪用玉制度 .....</b>	<b>178</b>
一、瑞与器概念的理论分野 .....	179
二、圭璋瑞器的文献形态 .....	183
三、瑞与器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反映 .....	189
四、虞舜“璇玑玉衡”的考古学实证 .....	192
<b>第八节 传统古史架构中的政治因素 .....</b>	<b>197</b>
<b>第二章 夏朝的历史与文化 .....</b>	<b>203</b>
<b>第一节 夏后氏族源与三大集团新论 .....</b>	<b>205</b>
一、考古学文化揭示的族源关系 .....	207
二、文献揭示的夏后氏族源 .....	213
三、上古族集团与华夏新论 .....	218
四、“华夏”的族源及其构成 .....	230
<b>第二节 夏代社会及其早期的部族斗争 .....</b>	<b>235</b>
一、关于夏代奴隶制问题的讨论 .....	236
二、大禹政绩及其治水地望 .....	244
三、禅让制与世袭制的博弈 .....	250
四、甘之战及有扈氏的族属和地望 .....	261
五、后羿代夏与太康失国 .....	268



第三节	夏朝的巩固和发展 .....	280
一、帝相流亡地的考证.....	281	
二、少康复国及其兴夏的政策.....	286	
三、功绩堪比大禹的帝予.....	293	
四、巩固发展期的其他夏王事迹.....	296	
第四节	夏朝的败亡 .....	302
一、孔甲乱夏.....	302	
二、夏桀的覆灭.....	306	
三、亡国后的夏人流向.....	312	
第五节	夏朝时期的方国与部族 .....	316
一、夏朝的疆域.....	316	
二、夏朝的同姓方国.....	318	
三、夏朝的异姓方国与部族.....	325	
第六节	夏朝考古 .....	327
一、夏朝考古的探索历程.....	327	
二、大禹的时代——王湾三期文化晚期.....	330	
三、夏朝考古的新课题——新砦期.....	337	
四、夏朝中晚期——二里头文化.....	340	
第七节	夏朝的文明 .....	343
一、夏朝的政治.....	343	
二、夏朝的经济与技术.....	351	
三、夏朝时期的文献和信仰.....	362	



## 第一章

# 虞代历史与大舜文化研究

### 引言

上古“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毫。惟《史记》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兗州在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

这是著名国学学者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对中国上古政治地理态势的一种概括。王氏此论发表之时，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尚不够发达，据史而议即有如此见解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某些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的讨论，其基本构架却是大致不错的。

史谓：太皞以龙纪，黄帝出自天鼋，幻化为龙，于是，中华儿女众口一词地宣称：“我们都是龙的传人”；炎帝世衰，黄帝取而代之，于是，中华儿女又异口同声地宣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和民族和谐团结的“文化符号”，笔者对此是十分尊崇和深信不疑的。但是，随着研修的逐步深入，耳边的另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烈：太皞出东方，像日月之明，很难说就是龙的化身！炎黄“共出于少典”，为何不直接说“我们都是少典子孙”？按照传统史观的架构，在中华上万年的历史进程中，自少皞以晚的历代皇（王）族，几乎无不出自黄帝；反观炎帝族系，自神农“德衰”之后，似乎再也没有大的作为，见于记录的似乎也只有几个诸侯、方伯，很早就被归入“旁系另册”，更不用说执中华之权柄了。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中华儿女又只能是“黄帝子孙”，与炎帝他老人家似



乎没有多少关系！先秦儒墨诸子以尧舜为古帝之先，位列帝尧、帝舜以前的远古诸帝又当如何解释！

带着这些疑惑，古往今来，无数贤达，孜孜以求，穷其皓首，以期能把问题整理得更清楚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科学史观和现代考古学的传入，中国古史研究在左冲右突仍不得其解的迷惘中，迎来了疑古、非古的时代。诸如“三皇五帝”和虞、夏、商王朝是否存在？！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大都因缺乏明确的文献记录而成为久讼难决的悬案，曾经盛极一时的疑古思潮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反映。

1923年，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以其犀利的笔锋指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sup>[1]</sup>。顾氏之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史学界对早期古史的基本看法，可谓一语中的，击中了传统古史体系的痼疾死穴，引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古史研究革命”，颠覆了“厚古薄今”、“祖宗家法不可违”的传统思维模式，使人们可以不再抱残守缺，转而用全新的角度审视传说时代，厥功甚伟。

然而，矫枉过正，随着疑古、非古风气的不断发酵，夏商及其以前的古史，都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夏代始祖大禹变成了蜥蜴之类的爬虫，甚至西周初年也在被否定之列<sup>[2]</sup>。一时间“伪托”和“托古改制”之说甚嚣尘上，把老祖宗千百年来苦心构建的古史体系批得体无完肤。最终发展到只要文献记载互有抵触或稍有疑问，便予以否定。有关孙武、孙膑及其兵法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史记·孙武吴起列传》：“孙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世传其兵法。”

《汉书·艺文志》有吴孙子和齐孙子，《隋书·经籍志》则未见著录。有人因此而提出怀疑，认为《孙子兵法》是后人伪托，甚至对是否确有孙武其人也持否定态度。直到1972年在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孙膑两种兵法竹简，才结束了这段公案。所以，当时就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古史辩论者“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们的结论为是”<sup>[3]</sup>。

[1]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1页。

[2] 顾颉刚根据《说文》对“禹”字的诠释，认为“(禹)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运动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顾颉刚后来放弃了这一主张。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近数十年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不少学者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古史研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过度的疑古、非古已是风光不再。经过几代考古人近百年来执著探索，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方法论基础，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远古中国域内原初民族的聚集、碰撞交流和发展衍化的基本格局。很多古史研究者也把搜寻的目光投向了高深莫测的苍茫大地。中国古史研究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重生，终于从信古和疑古、非古的彷徨徘徊中，步入了一个崭新的“考古、释古时代”。

但是，传统的“厚古薄今”倾向和近百年来形成的疑古学风，仍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加之各地方政府对“发掘传统文化”、“振兴旅游经济”的强劲需求，新一轮“古史研究”的热潮方兴未艾。以至于人文始祖满天飞，文明中心东西南北无所不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这些问题的出现，除当前社会环境因素外，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思维模式被否定之后，对新“方法论”的理解和运用等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忽视了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基本格局，未能有效地兼顾“远古中国”整体人文历史背景和时空结构关系。而在课题目标、材料取舍、逻辑辩证等方面出现了某种偏差。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唯物主义史观，坚持用科学分析的方法，而不是怀疑的眼光，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而不是用某种形式的思维定势，以考古研究揭示的史前社会和远古部族为基础，仔细地甄别、但不轻易地否定或舍弃每一条史料，将虞舜时代及其相关史迹置于“远古中国”的总体时空环境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作出更为合理的阐释，为弘扬传统优秀文化，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贡献。

笔者不敏，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成果，从“远古中国”和“古史传说体系”的视角出发，对大舜的历史、文化、族属关系等问题作一次新的审视，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 第一节 传统的古史架构

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史传说，是在史前时期某些时空节点上，通过口耳相传而保留下来的一些零星碎片，由于年代久远和传说的增饰效应而显得杂乱无章，空间模糊，时序颠倒，相互抵牾。有如一堆混杂着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残旧“拼图”，很难拼接出一幅完整的画面；而早期的“正统典史”却又孜孜以求，“层累地”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裁剪拼接”，使本来就残缺不全的“拼图”因此而



变得更加破碎、更加凌乱。因此,只有摈弃“裁剪式”拼接的方法,转而采用类似考古学修复出土陶器,将发掘得到的大量陶器残片按出土单位、层位关系、陶质陶色和器形等技术指标进行“分类”拼对,以获得复原数据的操作模式,将历史传说的“拼图残片”,按文化传承、部族特征和时空逻辑关系进行分类比对,才有可能得到近似史实的“拼接”结果。

大舜是中国远古部族有虞氏的首领,亦称虞舜或帝舜,是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三皇五帝”的重要组成人员。探讨虞舜时代和大舜文化,不能不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相关人物,亦即传统古史所谓“三皇五帝”系统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作基本的梳理,以便为探讨虞舜的族缘关系、迁徙发展建立一个可供依托的时空框架结构。

依据孔夫子和司马迁的记述,中国的古代文明,也就是华夏文明肇始于虞舜时期。作为“五帝时代”最后一位古帝,虞舜在古史分期中,也可以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与众不同的地位。在先秦学者,特别是崇尚历史的儒墨诸子心目中,虞舜时代是中国“国家”历史的开创期,其代表人物大舜则是中华传统文明道德、礼仪典章制度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先圣。孔子“祖述尧舜”而不及以远;《尚书》以《虞书》作为其历史记录的开篇;《孟子》言必称尧舜,通篇用很大的篇幅来阐发尧舜之道;在《论语》、《左传》、《墨子》、《国语》、《周礼》、《礼记》等先秦文献中,则用“虞夏商周”四代连称来指代中国的古史时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虽然罗列了“五帝”事迹,却仍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有虞一代的认识却是千差万别,或承认,或否定,或大而化之,或具体而细末。本章拟从古史传说的整体格局出发,依据考古学物质文化所揭示的远古部族分野和社会发展状况,对虞舜时代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作出初步的界定。

## 一、古史传说的不同体系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总结红军长征伟大意义时说过的一句话。太史公司马迁不采信三皇之说,而以《五帝本纪》为《史记》的开篇,说明在司马迁的眼中“三皇”是很难考究的。即便是“五帝”,太史公也秉持谨慎的态度:“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乃“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sup>[1]</sup>。

“三皇五帝”大抵是春秋至汉代期间形成的一种古史体系,版本既多且又相

[1] 《史记·五帝本纪》。



互抵牾，让后世的研究者无所适从，难以把握。因此，学界通常将夏王朝之前的时代，亦即“三皇五帝”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传说时代”。从时间顺序山上说，在先秦典籍中出现时间最早，并有具体事迹的先圣，见于《逸周书·尝麦解》所称赤帝、黄帝、蚩尤和少皞。除此之外，只有尧、舜、禹三位，且多见于以传习历史见长的儒、墨两家的著述中<sup>[1]</sup>。“三皇五帝”的称谓，则是阴阳五行概念出现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见于《周礼·春官》，即所谓“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和《天官冢宰》的“祀五帝”等，《吕氏春秋》也较多地使用了这一提法<sup>[2]</sup>。

关于三皇，大致有以下几种组合：

(1)燧人、伏羲、神农。见于《尚书大传》、《礼含文嘉》，但后者颠倒了燧人氏和伏羲氏的次序，而以伏羲氏居首；应劭《风俗通义》支持此说。《孝经援神契》、《白虎通义》的次序则为伏羲、神农、燧人。

(2)燧人、伏羲、女娲。见于《春秋命历序》。

(3)伏羲、女娲、神农。见于《春秋运斗枢》、《春秋元命苞》；郑玄《尚书》注、班固《文选》注、司马贞《三皇本纪》均同此。

(4)伏羲、祝融、神农。见于《礼号谥记》、《白虎通义》，唯后者以祝融居末。

(5)伏羲(太皞)、神农、黄帝。见于《帝王世纪》、《金楼子·兴王》、《礼稽命征》；孔安国《尚书序》、孙氏注《世本》亦采此说。

此外，还有完全神化的三皇，如天皇、地皇、泰皇<sup>[3]</sup>，或天皇、地皇、人皇等。道教经典则将三皇分为初、中、后三组：“初三皇”还有人的模样（或说其分别有十二头、十一头、九头）；“中三皇”为人面蛇身或龙体，分别有十三头、十一头、九头；“后三皇”中的天皇为伏羲氏，地皇为女娲氏，均为人首蛇身之体，后人皇为牛首人身的神农氏。汉代画像石和帛画中常见的伏羲、女娲即为尾部缠绕在一起的人首蛇身形象。

关于五帝，大致有以下几种组合：

(1)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见于《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淮南子·天文训》、《潜夫论·五德志》、《汉书·魏相传》、《孔子家语·五帝》、《白虎通义·五行》等同之。

[1] 《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墨子·尚贤中》：“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也。”

[2] 《吕氏春秋·禁塞》：“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类似的提法并见于《贵公》、《用众》、《孝行》等篇。

[3] 《史记·秦始皇本纪》。



(2)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见于《鬻子·贵道》、《世本》、《大戴礼·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白虎通义·号》、《风俗通义》、《刘子·辩乐》、《春秋元命苞》等同之，谯周亦采此说。

(3)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见于《战国策·赵策》，《三统历》亦承此说。《通鉴外纪》虽未点明“三皇五帝”，但其开篇所列五个人文始祖就是按这个次序排列的，接下来就是夏代的世系，用意很是明白。

(4) 少皞、颛顼、高辛(帝喾)、尧、舜。见于《尚书序》、《金楼子·兴王》，《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均采此说。

(5) 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尧。见于《道藏·洞神部·昆元圣记》。据说是依梁武帝萧衍“画像碑述”而确定的。但萧衍似乎没有这样一部著作，陈立《白虎通疏证》认为“画像碑述”可能是《武梁祠堂画像碑述》之讹。也有可能是因郑玄注《尚书中侯敕省图》，以轩辕、少皞、高阳、高辛、陶唐、有虞为“六代五帝”，谓其俱合“五帝星座”。《道藏》为满足“五行”的需要，而截止于陶唐。

同“三皇说”一样，“五帝说”也存在神化的系统，如《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以五帝为主管四方、四时和五行之神。以黄帝土德，居中；太皞木德，居东方，主春，亦称青帝；炎帝火德，居南方，主夏，亦称赤帝；少皞金德，居西方，主秋，亦称白帝；颛顼水德，居北方，主冬，亦称黑帝。将五帝与五方天神合而为一。《春秋文耀钩》还有：“苍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等等。

通常认为，“五帝”说最早形成于战国时期，战国末期出现了年代更为古老的“三皇”，汉代正式将“三皇”组合加在“五帝”之前。以现存文献而论，有关“五帝”组合，可追溯到《周书》、《周易》、《左传》和《国语》成书以前的时代。

《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皞，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尝麦解》记述了炎、黄、少皞、蚩尤四位古帝，《易·系辞》有庖牺、神农、黄帝、尧、舜五位先圣，《左传·昭公十七年》则为黄帝、炎帝、共工、大（太）皞、少皞。



五人<sup>[1]</sup>；《国语·鲁语上》鲁大夫展禽在议论时政时，依次列举了烈山氏、共工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古代圣王的主要功绩。尽管上述文献都没有使用“五帝”的称谓，但其所列人物都属于“五帝”的组成人选。《孙子兵法·行军篇》有“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之语。

《鬻子·贵道五帝三王周政》：“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故其道若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为万代之始，后之不能加也。”

这应是目前所见较早以黄帝、颛顼、高辛、帝尧、帝舜为五帝的先秦史籍。虽然学界对《鬻子》的成书年代尚有不同看法，但其为先秦文献当无问题。而前引《周礼》关于“掌三皇五帝之书”的记载，则是见之于经书的唯一例证。

《荀子·非相》有“五帝”的提法<sup>[2]</sup>，却没有列举具体人物；其《议兵篇》则有“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以尧舜禹汤为四帝。《庄子·天运》：“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在其《缮性》篇中依次列举的有遂人、伏羲、神农、黄帝和唐、虞等六位圣贤；《管子》和《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情形。出土战国竹简《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简8则有“六帝兴于古”<sup>[3]</sup>的说法。

《礼记·内则》：“凡养老，五帝宪（法），三王有乞言。”

《吕氏春秋·先己》：“五帝先道而后德；三王先教而后杀；五伯先事而后兵；当今之世巧谋并行。”

《荀子·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

说明在战国学者眼中，五帝、三王、五伯（霸）为不同的历史单元；其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是执政理念和道德标准，与当今以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属性的判别标准有着很大的区别。

从起源和系统分类的角度说，上述不同种类的五帝组合大致源自两个系统：

一是黄帝族裔的“正统体系”，出自“有史”以来即占据统治地位的姬姓周人

[1]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

[2] 《荀子·非相》：“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外无传政”。

[3]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及其追随者。根据上面的列举可知,《五帝德》所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应源自于《国语》、《鬻子》等早期文献;而《帝系》所列以黄帝为始祖的“五帝血统”,也应与《国语》所记虞、夏、商、周“四代”祀典所禘、祖、郊、宗、报的人物关系<sup>[1]</sup>密切相关。《史记·五帝本纪》几乎完全照搬了《五帝德》和《帝系》的说法。太史公所谓“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sup>[2]</sup>,清楚地说明了其文献依据。

二是皞帝族裔的“另册体系”,初见于已经失传的秦人“史记”《秦纪》,起初只有白(少皞)、青(太皞)、赤(炎帝)、黄(帝)四位,为秦人所祀之帝<sup>[3]</sup>。《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和《礼记·月令》将颛顼列入,名之为四方五行之神。其记录分散在四季之中。《淮南子·天文训》的记述大致相同,唯其径直以“何谓五星”启首:

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地,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为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不难看出,上引各种不同的五帝组合,基本上都是由这两种系统派生出来的。其主要区别在于,正统史家,如周室典史和儒墨诸子,更注重“历史性”和所述人物的“人格”。但其建立的体系掺杂了过多的情感因素,如“炎黄同源”,“五帝均为黄帝血统”等等;秦人为新兴国族,发迹较晚,尚军功而不太注重“君君臣臣”等血统观念的束缚,又恰逢“五行”盛行之时,所述五帝各主一方,没有人为的血统关系,但其“神格”色彩过于浓厚。

三皇五帝系统之外,还有众多的远古帝王,如《庄子·胠箧》列举的古帝有12人,其中10人名列伏羲神农之前;《六韬》列举了15名;《逸周书》所列古帝多达26名。《史记·封禅书》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在这些古帝中较为显赫和常见的有盘古氏、混沌氏、有巢氏、少典氏、华胥氏、蚩尤氏、无怀氏、大庭氏、赫胥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

[1] 《国语·鲁语上》。

[2] 《史记·五帝本纪》。

[3] 《史记·六国年表序》,太史公自称《秦本纪》和《封禅书》是根据秦人史官所作《秦纪》而写成的。



氏、尊卢氏、皞英氏、葛天氏等等。

盘古氏是开天辟地、创世纪式的天神<sup>[1]</sup>。死后身体化为日月雷电，山川万物<sup>[2]</sup>。这一神话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太常卿徐整结合南方苗民“盘瓠”传说整理而成的。出现时间虽然较晚，但其雏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现端倪。

《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楚辞·天问》：“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淮南子·精神训》：“古未有天地之时，唯象无形，窈窈冥冥，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

《庄子》所称浑沌，乃是沒有七窍的天地未开之形。《天问》所提的问题正是对盘古开天地的“设问”，可与《淮南子·精神训》相对应。有巢氏，则是开天辟地之后的第一位古圣，也称“大巢氏”。

《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始学篇》：“上古皆穴处，有圣人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

由于文献记载失于过简，或有其名而无其事，或有其事而无其序，加上疑古学风的影响，包括三皇五帝在内传说人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荒诞无稽”，应予彻底摈弃的“谎言”。毋庸置疑，“三皇五帝”诸说形成的时间次序和千古系于黄帝的“帝王血统”，确有明显“层累叠加”的痕迹。但时至今日，曾经饱受古史辨学派非议的殷商王朝世系，通过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已得到了确切的实证；“虚无缥缈”的夏后氏王朝，经过考古学界数十年的努力，其都城、物质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得到了基本确认；即便是古史辨学派学者也承认

[1] 徐整《三五历记》，《太平御览》卷二引：“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

[2] 《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